

关系结构两重性视角下的信任与民主

李元来

(安庆师范学院人文与社会学院 安徽安庆 246133)

摘要: 政治领域中的信任研究逐渐兴起,当下理清信任与民主关系问题十分必要。把握信任与民主问题的关键,在于将其放置于信任与政治关系的背景框架之中进行分析,也就是说,信任与政治关系结构的两重性是我们认识信任与民主关系的两个重要分析维度。

关键词: 信任 政治 民主 结构张力 结构相似

中图分类号: D 62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4580(2011)04-0063-(04)

自1970年代以来,在既有学理基础和相关社会背景的催生下,政治领域中的信任研究逐渐兴起,并成为国外政治学界研究的热点问题^[1]。民主是指一种既区别于君主制、又区别于贵族制的政府形式,在这种政府形式中,人民实行统治。经历了三波“民主化浪潮”之后,民主已经成为现代政治合法性的来源。现代社会俨然处于一个民主的时代。因而,政治领域中有关信任问题的研究,必然要深入考察和分析信任与民主之间的关系问题。这不仅是理论分析逻辑上一种的递进,而且也是对现实政治问题一种的回应。把握信任与民主关系的关键,在于将其放置于信任与政治关系框架之中进行分析。信任与政治关系结构的两重性是认识信任与民主关系的两个重要分析维度。

一、信任与政治关系结构的两重性

亚里士多德提出“人是天生的政治动物”。对古希腊而言,城邦的兴起意味着人们在以家庭为中心的私人生活之外,开始接受了另外一种生活,即政治生活。在私人生活领域中,信任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在政治领域中,信任问题并非不证自明。“信任是理解政治行为的核心,提出这种观点是需要加倍小心的”^[2]。邓恩认为,信任对于专制主义的捍卫者而言,在政治上是没有疑问的。然而,一旦将政治构想为一种代理行为,即个人、集体的合作性和策略性的互动,信任的理性问题就是不可避免。

“信任的理性问题”的突显,根本上是源自于信任与政治之间所存在的特殊张力。一般而言,

信任的存在需要有一个前提条件,即信任者与被信任对象(人、机构或抽象制度)之间没有根本的利益冲突,或者至少没有不能被其他关系、保证或保护所调和的利益冲突。然而,这在政治中是成问题的。“在有政治的地方,信任状况是不佳的:信任者与被信任者之间的利益聚合不能被想当然”^[3]。社会关系的典型特征是以共享利益和共享文化为基础,并且这些共享的利益和文化能够提供有关被信任的个体或制度的信息。在政治关系当中,共享的利益并非理所当然,并且互动各方的行动也很少受共享文化的约束。政治关系是一种特殊的社会关系,它具有冲突和权力的特征。政治关系并没有为信任的产生提供一个自然环境。沃伦指出,社会环境与政治环境之间的内在差异决定了信任与政治之间的结构张力。社会环境因为如下两个因素而能给予信任一定程度上的保证:其一,利益和/或身份(连同他们的共同价值观和伦理义务)趋同的结果便是被信任者无意滥用这一关系;其二,共同的社会环境给信任者提供有关被信任者可靠性的重要信息。然而,这两个条件在政治环境里是不足或缺失的。

信任与政治关系之间的结构张力在某种程度上阻碍了政治领域中信任研究的展开。米兹塔尔认为,“信任是从哲学和政治文献中引入社会学理论的一个概念,然而信任概念却从来没有成为社会学理论关注的中心”^[4]。其实,在1970年代之前,信任不仅没有成为社会学理论关注的中心,而且在政治学研究当中也是处于边缘地位,甚至

被忽视。其后,政治领域中的信任研究才得以兴起。未来导向和风险两个因素是这种研究趋势的内在结构条件。同时,它们也是信任与政治关系结构的相似与共通之处。

一方面,信任和政治在本质上都以未来为导向;另一方面,基于未来导向,信任和政治都具备风险的特征。什托姆普卡将信任界定为“相信他人未来的可能行动的赌博”^[5]。这个定义不但把握了信任的本质,而且还突显了信任的两大特征,即未来导向与风险。信任是一种行为方式,它总是出现在人类行动背景当中。行动最重要的特征是它指向未来。未来行动的不确定性和不可控制性,使信任必然蕴含着风险。这一点卢曼也关注到了,“信任理论是以时间为前提的”,显示信任就是为了预期未来。他将信任视为一种“风险投资”;与什托姆普卡所不同的是,卢曼将信任的风险特征归因于未来的复杂性。“未来包含的可能性,远远多于现在可能实现的、因而可能转变为过去的可能性”^[6]。

政治在本质上也是未来导向的。“政治就其本质而言是一个具有合作性代理行为的复杂领域,它将众多的自由行动者联系起来,这些行动者不知道彼此的将来行动,在某种程度上又都依赖于彼此之间的将来行动”^[7]。彼此相互依赖的将来行动也给政治带来了不确定性和风险。总之,信任与政治之间的结构相似之处就在于,通过承担面向将来行动的风险来扩大行动的可能范围。结构相似和结构张力体现了信任与政治关系结构的两重性特征,这使得信任与政治处于一种复杂多样的关系中。一方面,“信任的条件在政治中是最成问题的”,另一方面,“恰恰由于政治关系的新生性,信任是潜在地令人满意和有成效的”。

二、结构张力视角下信任与民主的关系:民主的悖论

在信任与政治结构张力视角下考察信任与民主的关系,我们会发现民主介于信任与不信任之间。一方面,民主理念的逻辑前提是对基本人性的不信任,对权威的怀疑,并通过一系列的设置将这种不信任制度化。巴伯认为,“一个民主的政体需要以民主的忠诚为基础的合法批评;在这个意义上,某些不信任对于一个可行的民主秩序是必不可少的”^[8]。另一方面,民主制度的有效运行需要一种“元信任”,即对民主制本身的信任,并为其提供信任保障。“一旦这种元信任不复存在,它便不能确保其他类型信任的正当性,

人们就会产生一种被欺骗感。在这种情况下,信任文化行将崩溃”^[9]。

处于信任与不信任之间的民主,延续了信任与政治之间的结构紧张关系,表现出一种悖论的特征。什托姆普卡将这种民主的悖论总结为:第一,制度化的不信任越多,自发的信任就会越多;第二,民主的检查和控制的广泛的、潜在的有效性必须和其非常有限的现实化相适应。他详尽地分析了在民主政治基本原则当中所蕴含的制度化不信任因素。如合法性原则意味着对所有的统治本身的不信任,定期选举与任期制是对统治者主动交出手中权力以及定期接受公众审查的意愿的不信任,多数原则与集体决策原则暗含了对单个人客观公正性的不信任,分权制衡和有限政府原则是对政府机构独断专行、滥用权力的怀疑,法治原则和司法独立原则是对公民以及政府机构天然善意的置疑,宪政与司法审查原则是对立法机关的不信任等等。这些原则都对人性善持怀疑态度,都假定人性在政治过程中必然会堕落,并设计出一系列的规则来制约政治行为。基于对人性不信任而设立的这套规则,为信任文化产生的结构性背景因素创造了良好的环境条件。民主的基本原则不但有利于增加规范的确定性、社会组织的透明度、社会秩序的稳定性的、权力的责任性、权利和义务仲裁的正当性、责任与义务的执行力,而且还有利于强化对单个社会成员人格、尊严与自主的维护和尊重。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来说,制度化的不信任越多,自发的信任就会越多。

实际上,民主的第一个悖论是理想类型层面上的分析。制度化的不信任引发自发的信任还只是一种理论上的可能。在什托姆普卡看来,将这种可能性转化为现实信任文化的强烈唤起必须满足两个前提条件:第一,民主原则必须是可靠的,即它们必须得到普遍一致的推行与遵守。第二,作为一种最终手段,民主原则蕴含的控制手段必须得以谨慎行使。民主原则将不信任制度化,并为违背信任的行为提供相应的纠错机制。培育信任文化不仅要求这些纠错机制在实践中得到始终如一的遵行,而且要求这些纠错机制不能被随意运用。在这里涉及到一个度的问题,如果纠错机制被频繁动用,那么就说明有太多违背信任的行为需要纠错,结果可能反而不利于信任文化的培育。这就是什托姆普卡所说的民主的第二个悖论,即控制手段的有效性取决于其实际动用的有限性。制度化的不信任必须在幕后为自发的信任行为提

供保证措施。

三、结构相似视角下信任与民主的关系：民主的欢呼

英国著名小说家福斯特曾给予民主两声欢呼：一是为它崇尚多样性；二是为它允许批评^[10]。尤斯拉纳则提出民主得到第三声欢呼的可能性，即民主社会是具有信任感的社会^[11]。将信任与民主联系起来考量，是因为信任与政治在本质上具有某种相似性。这种相似性为研究者分析信任与民主的关系提供了逻辑前提。他们主要关注信任与民主之间的相互作用问题，即民主值不值得第三声欢呼？民主的第三声欢呼从何而来？具体来说，主要有两个研究理路：第一，分析信任感对民主社会意味着什么，即回答信任能否以及怎样“使民主运转起来”的问题；第二，分析民主的社会何以具备信任感，即回答“民主能创造信任吗？”的问题。

信任在多个领域中发挥着积极作用，这一点在学界基本达成共识。尤斯拉纳认为信任是“社会生活的鸡汤”，卢曼认为信任是一种“复杂性简化”的机制，阿罗认为信任是“经济交易的润滑剂”，米兹塔尔认为信任是“社会秩序的基础”。在政治领域中，研究者同样注意到了信任的积极作用。普特南通过对意大利1970年制度变革后地方治理的20多年跟踪研究发现，由信任组成的社会资本虽然不易建立，可“它却是使民主得以运转的关键因素”^[12]。不过，在信任对民主发挥作用的具体机理问题上，研究者因分析角度不同而出现分歧。

与普特南将信任看成社会资本的核心组成部分不同，纽顿提出了政治资本的概念，并将政治信任看成是政治资本的核心组成部分。在纽顿看来，政治信任不同于社会信任。社会信任对市民社会生活至关重要，作为一种政治资本的政治信任在民主的、稳定的政治生活中举足轻重。“在许多方面，政治信任和政治资本的理念是传统博爱（与自由和平等相结合）概念的现代社会科学翻版。政治信任和政治资本是民主的必要条件”^[13]。阿尔蒙德和维巴视信任为一种政治文化。通过对英国、美国、德国、意大利和墨西哥五国公民文化的比较研究，他们分析了政治文化与民主制度的建立、稳定和效率之间的关系。在他们看来，“社会信任有助于这些国家公民们的政治合作，若没有它，民主政治是不可能实现的”^[14]。派伊进一步区分出两种不同类型的政治文化：一种是建

立在信任他人和他人一起工作是可能的基本信念之上的政治文化，另一种是建立在大多数人都将是不被信任的以及陌生人尤其可能是危险的预期之上的政治文化^[15]。在他看来，前一种政治文化与是与民主密切联系在一起的。阿尔从社会心理的角度分析了信任对民主的作用。他将民主过程看成是一种社会心理现象，并认为信任是民主政治过程的心理基础。“信任某人和被某人信任，既构成一个本质上具有实际特征的心理倾向和信仰模式，也构成一种道德责任模式……作为心理倾向和道德强制的一种相关模式，信任关系在两种民主形式（深厚的民主与薄弱的民主）中是不相同的”^[16]。伊斯顿从宏观政治系统分析的角度考察了信任的合法性功能和模式维持功能。他将信任视为一种隐性的支持，即“以一种态度或情绪来支持”^[17]。当信任输入政治系统后，它便会与支持的三种对象——政治共同体、典则、当局——产生密切的联系，并发挥出维护政治系统稳定的作用。

“民主能创造信任吗？”什托姆普卡的回答是肯定的。“信任是民主政治的产物”。在所有其他条件相等的情况下，信任文化在一个民主的政治制度中比在任何其他类型的政治系统中更有可能出现。与什托姆普卡的理论断言相比，尤斯拉纳较为谨慎地指出，“民主通往信任之间有一条漫长而曲折的道路”。尤斯拉纳将时间维度引入对分析信任与民主关系问题分析。“民主制度运作得是否良好，更多地取决于它在一个国家内实行时间的长短，而不是公民信任感的高低”。在中短期内，民主制度对信任的建立起的作用很小，比如在中欧、东欧前社会主义国家，民主化与社会信任的相关性微乎其微，有时甚至是负值。尤斯拉纳分别在1990年和1995-1996年间对8个走上民主化道路的东欧国家进行了信任调查，结果发现只有拉脱维亚一国对他人的信任感有所增长，爱沙尼亚、立陶宛、俄罗斯、波兰、白俄罗斯、东德、斯洛文尼亚等七国对他人的信任感都有不同程度的下降。与此同时，这些国家的立宪民主程度却在不断提高。在这些国家中，民主化对信任的影响微乎其微。正如尤斯拉纳所言，“只有在长期存在的民主体制中，民主才有可能影响信任”。

四、结语与讨论

值得注意的是，为了分析的方便，我们分别论述结构张力视角下的“民主的悖论”和结构相似视角下的“民主的欢呼”。实际上，结构张力和

结构相似密切相连,不可分割。信任与民主相互之间的关系是建立在信任与政治关系结构两重性的基础之上。在此基础上的信任与民主关系既非是简单的对等关系,也非简单的对立关系。任何对等或对立看待信任与民主两者之间关系的做法都较为随意和武断。帕特森在这一点上的认识较为深刻,“在信任与民主之间有一种密切的甚至本质的关系。但这种关系特别麻烦,极端地假定它们之间简单的二元关系是把复杂问题简单化”^[18]。

信任与民主关系之所以“特别麻烦”,是因为信任和民主概念内涵极其丰富,并由此引发一系列具体的相互关系问题。信任和民主不是单面的、静止的、抽象的概念,而是在分析和实践的过程中形成了“一个复杂的语族相似现象”。从不同角度考察,信任就有不同的类型,如政治信任和社会信任、人际信任与制度信任、特殊信任与普遍信任、情感信任与策略信任等等。这些信任都民主起作用吗?哪些是较为有利的?哪些是较为无益的?如何将无益的转化成有利的?同样,从不同角度考察,民主也有不同的模式、面向和维度。赫尔德划分出两大形式的民主模式:直接的或参与的民主和自由的或代议的民主^[19]。在这两类民主形式中,信任所起的作用是否等同?什么类型的信任更加适合相应的民主形式?英格尔哈特认为,“在考察信任与民主的关系时,区分民主的三个不同方面是至关重要的”^[20],即民主的长期稳定、特定时间点上的民主水平以及民主水平的短期变化。信任与民主的稳定有何关系?信任与民主的程度有何关系?信任与民主的转变(民主化)有何关系?萨托利认为,民主一词自产生以来,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它一直是一个政治概念,“但是今天我们也从非政治或准政治的意义上谈论民主”^[21],即社会民主、工业民主和经济民主等。信任与社会民主关系怎样?信任与工业民主关系怎样?信任与经济民主关系怎样?这些都是信任与民主关系研究中非常棘手而又不得不面对的问题。

要想系统地把握信任与民主之间的关系,就必须对其做出全面而系统的分析。这不仅需要在理论上系统清理信任与民主关系的可能状况,而且更需要相关实证研究资料进行佐证。实际上,在既有的理论分析和经验研究中,信任与民主的复杂关系常常被化约了。正如沃伦所言,“‘民主与信任’的问题被可用资料缩小为‘自由民主政府与信任’的问题”^[22]。不仅如此,研究者往往

还忽略了对信任与非政治或准政治意义上的民主关系的关注。这样的化约和忽视,将不利于我们深入理解信任与民主之间复杂而微妙的关系。

参考文献:

- [1]上官酒瑞 程竹汝. 政治信任研究兴起的学理基础与社会背景[J]. 江苏社会科学, 2009(1): 126.
- [2][英]约翰·邓恩. 信任与政治行为[A]. 郑也夫. 信任: 合作关系的建立于破坏[C]. 北京: 中国城市出版社 2003. 90.
- [3][美]马克·沃伦. 民主理论与信任[A]. 马克·沃伦. 民主与信任[C]. 吴辉译. 北京: 华夏出版社 2004. 291.
- [4]Barbara A Misztal. Trust in modern societies: the search for the bases of social order [M]. Polity Press ,1996. 1.
- [5][波兰]彼得·什托姆普卡. 程胜利译. 信任——一种社会学理论[M]. 北京: 中华书局 2005. 33.
- [6][德]尼克拉斯·卢曼. 瞿铁鹏, 李强译. 信任[M]. 北京: 世纪出版集团 2005. 17.
- [7][英]约翰·邓恩. 信任与政治行为[A]. 郑也夫. 信任: 合作关系的建立于破坏[C]. 北京: 中国城市出版社 2003. 101.
- [8][美]伯纳德·巴伯. 牟斌等译. 信任: 信任的逻辑与局限[M]. 福建: 福建人民出版社 ,1989. 77.
- [9][波兰]皮奥特·斯托姆卡. 信任、不信任与民主制的悖论[J]. 经济社会体制比较, 2007(5): 70.
- [10]Edward Morgan Forster. “Two Cheers for Demeocracy.” In E. M. Forster, Two Cheers for Demeocracy. Harcourt, Brace, and World, 1965.
- [11][美]埃里克·尤斯拉纳. 张敦敏译. 信任的道德基础[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6. 283.
- [12][美]罗伯特·普特南. 王列 赖海榕译. 使民主运转起来[M]. 江西: 江西人民出版社 2001. 217.

(下转第 74 页)

[13] Kenneth Newton. "Trust, social capital, civil society, and democracy".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2001, 22 (2).

[14] [美]阿尔蒙德, 维巴. 马殿君等译. 公民文化——五国的政治态度和民主[M]. 杭州: 浙江人民出版社, 1989. 586.

[15] Pye L, Verba S. Political culture and political development. Princeton, New Jerse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65.

[16] [英]罗姆·阿尔. 吴辉译. 信任及其替代物: 政治过程的心理基础[A]. 马克·沃伦. 民主与信任[C]. 北京: 华夏出版社, 2004. 253.

[17] [美]戴维·伊斯顿. 王浦劬等译. 政治生活的系统分析[M]. 北京: 华夏出版, 1999. 185.

[18] [美]奥兰多·帕特森. 吴辉译. 自由反对民主国家: 论美国人不信任的历史根源和当地根源[A]. 马克·沃伦. 民主与信任[C]. 北京: 华夏出版社, 2004. 142.

[19] [英]戴维·赫尔德. 燕继荣等译. 民主的模式[M]. 北京: 中央编译出版社, 2004. 6.

[20] [美]罗纳德·英格尔哈特. 吴辉译. 信任、幸福与民主[A]. 马克·沃伦. 民主与信任[C]. 北京: 华夏出版社, 2004. 90.

[21] [美]乔·萨托利. 冯克利, 阎克文译. 民主新论[M]. 北京: 东方出版社, 1998. 9.

[22] [美]马克·沃伦. 吴辉译. 结论[A]. 马克·沃伦. 民主与信任[C]. 北京: 华夏出版社, 2004. 329.